

麦家与中国当代谍报文学

魏 艳

从 2014 年开始,擅长谍战题材的麦家突然成为西方媒体和出版界最为青睐的中国当代作家。^① 他的长篇小说《解密》(Decoded) 英译本于 2014 年 3 月 18 日由企鹅英国总部及美国 FSG 出版集团同步推出,在 21 个英语国家出版,取得了中国作家海外销售最好成绩,“其版税不仅远高于一般中国作家海外出版的 6% - 7%,而且已达到欧美畅销书作家才有的 15%。”^② 麦家也成为继鲁迅、钱锺书、张爱玲之后企鹅文库收录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6 月,《解密》(Decoded) ^③ 由西班牙语国家中最大的出版社西班牙 Planeta 出版,并纳入旗下 Destino(命运)书库,“这使得《解密》得以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以及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并列,这是中国当代小说首次入围这一西语经典文学书库。”^④ 此外,该书法文、德文、丹麦文版等也已推出。外媒的书评也不吝溢美之词,出版社故意用一些耸动的甚至有些不合逻辑的句子赞美他“可能是你从未听过的最受欢迎的作家”、“中国的 Dan Brown”。《经济学家》(The Economics) 在“Get into Characters, the Chinese novel everyone should read”的书评中,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的读者

仍然寥寥问津。但麦家的作品打破了这一魔咒。^⑤ 《纽约时报》刊登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知名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书评《麦家笔下中国间谍小说的心理焦虑》,文中认为麦家的写作结合了中国传统小说(例如公案小说中的梦境)、五四时期由西方引进的人物心理探索、后现代的后设小说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中国的苏联反特小说的影响。他的谍战小说并不写实,而是书写一种传奇,有时候也许是为了审查的需要歪曲历史或者

① 麦家,本名蒋本浒,1964 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县,1983 年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某部担任技术侦查员。1997 年转业到四川成都电视台任编剧,现为浙江省作协主席。

② 《麦家谈〈解密〉:畅销海外:我曾被冷落十多年》,引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5-23/6203988.shtml。

③④ 根据《解密》西语版编辑玛利亚曾谈到“当时我们为了给《解密》一个最佳的西语名字,就讨论了好几个星期。在我们看来,如果将‘解密’直译为西班牙语的‘解开密码’,其内涵就太狭隘了,因为这本小说的内容要远远超出这个话题。最后我们选区 El Don 作为书名,Don 是我们对男性的尊称,El Don 可以理解为一个特别的人或者一个天才等等,这符合主角容金珍的形象。”《麦家〈解密〉西语版首发 3 万本,销售行情看好》,引自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7-25/6424902.shtml。

⑤ “Get into Characters, the Chinese novel everyone should read,” (March,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ooks-and-arts/21599325-chinese-novel-everyone-should-read-get-characters。

使用大陆官方的政治术语。林认为麦家的小说深刻性上不如鲁迅或者张爱玲的作品,它有一些普遍人性的思考,但最有意思之处在于麦家作品里对时代的不见与洞见“他完全没有提到‘为人民服务’、五年计划和大跃进等,尽管他写的那个时代充斥着共产党的这些骄傲的说法。好像他和读者们达成了一个无声的协议:不提这些吹捧,只讲故事。”^①此外,《华尔街日报》《卫报》《每日电讯报》也都刊登过以称赞为主的评论。

《解密》是麦家2005年的作品(初稿完成于2002年),那时麦家在中国并不出名,他为国人所注意主要是影视剧的影响,2006年他的作品《暗算》被改编成电视剧,颇受好评,麦家也是编剧之一。之后中国的银幕上掀起了一股谍战剧的热潮。2007年麦家的《风声》全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刊,获得《人民文学》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2008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同年获奖作家有贾平凹、迟子建、周大新),2009年获得巴金文学奖,同年《风声》电影版(陈国富导演、编剧)票房大卖,主演之一李冰冰也获得当年第46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电视剧版《风声》《解密》分别于2011年及2016年播出。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身为浙江省作协主席的麦家也获邀参加,事后麦家透露习主席在与其握手时称自己看过他的《暗算》《风声》,赞扬他是“谍战剧第一人,歌颂的是爱国主义的精神”。^②至此之后,麦家一直获得国内媒体的正面宣传,《人民日报》多次宣传麦家作品在海外的好评。究竟麦家作品的特色在何处?为何会同时受到海内外媒体的一致好评?如何将其放在谍报小说的谱系下讨论它们对这一文学类型的颠覆与创新?这些均是本文欲处理的问题。也因此,在讨论麦家作品前,先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谍报小说的发展脉络。

一、谍报小说简介

谍报小说(spy fiction),顾名思义,有关间谍与情报工作的小说,内容“着眼于国际政治或军事主题,涉及国家机密、恐怖阴谋、军政危机,主角以卧底密探、假身份、双面间谍的身份运作,并且对罪犯的精彩刻画是其重点,尤其是罪犯掌握庞大的组织,作为犯罪的后盾,突显了主角的孤立无援、单兵作战的险境”。^③该类小说的题材及流行度与国际军事政治格局息息相关,在一战前随着各国情报机关的成立而兴起,二战时逐渐成熟,冷战时兴盛,苏联解体后衰落,“9·11”之后再度流行开来。擅长书写这类小说的作家也多数有在军情部门的工作经验。

就欧美谍报小说而言,写作风格大致分为浪漫派与写实派。浪漫派的间谍多为绅士型的冒险,最典型的如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创作的《James Bond》。此种类型的谍报小说游戏性强,多消费主义的植入。而写实类的谍报小说中间谍的生活往往不像James Bond那么光鲜亮丽,特别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以后的小说,往往会转向道德困境的探讨,反思英雄爱国的主题,间谍不再是为了国家牺牲小我的角色,其从事间谍工作更多也是为了个人生计需要,并且小说中间谍的真正敌人不再是来自外国的威胁,而是成为自己的内部情报机构权斗的牺牲品。以勒卡雷(John Le Carre)1963年的代表作《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① 林培瑞《麦家笔下中国间谍小说的心理焦虑》,引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books/20140508/t08maijia/>。

② 《麦家:习总书记直言不少谍战影视剧不尊重历史》,引自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6/c87423-25849270.html>。

③ 黄新生《侦探与间谍叙事——从小说到电影》,第252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8。

Cold》(中文译名为《冷战谍魂》)为例,故事讲述英国特工利马斯负责东德地区的情报网,他在退休之即,接受了圆场给予的任务,要消灭东德情报处的主管穆恩特。利马斯伪装成被圆场冷冻的特工成日酗酒闹事,吸引东德情报人员将其收买,并成功地利用东德反情报主任费德勒与穆恩特的过节,在供词中诱导东德人员怀疑穆恩特实为英国安插在东德的双重间谍,让费德勒在东德法庭上指控穆恩特。谁知在法庭上穆恩特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利马斯的反间计,费德勒被控有诬陷罪处死,最后利马斯才明了自己实为圆场为了保护穆恩特的双重间谍身份、除去对其产生怀疑的费德勒的一枚棋子,在逃离东德柏林墙之际,女友被赶来的东德士兵枪杀,利马斯也心灰意冷,跳下围墙后被射杀。这部小说中对特工这个职业有着各种审思,如没有年金、始终戴着面具表演等,特工不再是如007般光彩照人、智勇双全、最后都能全身而退的超人,而是有自己的烦恼和孤独的悲剧人物,而且不同意识形态的特工之间由于彼此处境的相同也会有惺惺相惜的一面。

苏联的反特文学是影响50年代中国反特文学的直接来源。1954-1962年中国潮锋出版社、青年出版社和群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一批苏联反特小说,很受中国读者欢迎。^①当时知名的作家例如尼古拉托曼(Николай Томан)、布良采夫(Георгий Брянцев)、斯图季特斯基(А. Н. Студитский)等,而且出版时间几乎与苏联图书市场同步。^②这类的小说背景多设定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或是之后的工业建设期间,敌人多为德国特务。故事吸收了侦探小说的悬念手法,以一桩凶案开篇,慢慢挖掘出潜藏在人民内部的特务。除了强调群众信息战的重要外,这些故事有两点尤为特别,一是指出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破坏分子。例如《深雪》写德国特务杀害了苏联

工程师后伪装他的身份,以各种暗号与潜藏的其他特务如工人日用品供应部食堂内的服务员、或者理发馆衣帽寄存室的管理人联络,他们联络的暗号包括“当汇报某一工业目标开始动工时,她就给他送来另一种菜代替肉饼;其中,炖羊肉是表示最重要的13号车间的建设完工了……剃头、刮脸、往头上洒香水、擦粉……等等、等等——这些平常的话都有着它的隐意,管理人很熟悉它们。换开25个卢布的请求是表示13号车间已开工了;而6张一个卢布票子的说法是危险的信号,是命令他隐藏到预先指定的地点去。”^③二是热衷于描写高科技犯罪,例如用电视发射机传真秘密图纸,用假眼睛照相偷拍军事现场,或者间谍以戒指识别潜伏的自己人等。这种将反特小说与科学幻想题材相结合是苏联反特文学现代性的体现“昭示着以苏联为代表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作为晚发现代化国家的事实,在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其首要任务不仅是国家安全,而且是高速健全其国家的工业体系。”^④

二、中国的谍报文学

间谍这个职业在中国古代即以存在,晚清时期也一度流行一些歌颂虚无党人的政治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往往称间谍为侦探。民国时期的作品,一类写神秘的女间谍,例如徐訏的《风萧萧》(1943)、孙了红的《蓝色响尾蛇》(1947)等。另一类侧重写抗日战争中中

① 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了苏联反特小说在中国的出版,1962年后,各大出版社都停止翻译出版苏联小说,一直到文革之后才恢复。

② 有关50年代苏联反特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可参看季星:《在娱乐与政治之间——中国反特小说研究1951-1965》,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论文,2012。

③ (苏)斯·阿列菲耶夫《深雪》,第49、50页,高萍秋译,天津通俗出版社,1955。

④ 戴锦华《谍影重重——间谍片的文化初析》,《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方间谍的机智,例如小平在40年代上海侦探杂志《蓝皮书》中连载的“女飞贼黄莺”系列(1948-1949),谍战片《天字第一号》(1945)等。到了1949年之后由于不同华语地区定义下的敌人不同,间谍们也各为其主,如邹郎60年代在台湾写作的《死桥》(1963)等一系列间谍小说仍以抗日为主,塑造出如“长江一号”这样的经典间谍形象,费蒙笔下的如《情报贩子》(1953)《骆驼奇案》(1958)等将故事设定在50年代的香港,写国共两党的情报人员在香港的国际情报争夺战。^①主要兴盛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也经常采用“卧底”的情节,讲述帮派分子与警察相互渗透卧底,暗含对民间伦理秩序与法制冲突的再思考或是身份焦虑。^②

受苏联的反特文学影响,反特小说是中国50年代极为流行的一种文学类型,主要写人民警察如何在群众的配合下发现隐藏在人民内部的美蒋特务。这类小说担负着意识形态宣传的任务,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特务往往都脸谱化或者丑化,例如恶狠狠的眼神、脸上长长的刀痕、扁平的鼻子、一张歪嘴、两道扫帚眉或者像刀一样的眉、一脸横肉、因常常过夜生活而导致的发青的脸、泛着黑紫色的嘴唇或者脸上的倦容、手指摸上去冰凉出汗、从香港来等,而对应的正面人物则是家庭和睦、渴望看毛主席巨像、衣着整齐干净、面貌质朴、热爱生活和自己的职业,“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不论从他们的言论上,或者行动上都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自己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③因此故事的悬念性不强,读者从对人物外型的描绘上即能猜测出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这使得中国的反特小说区别于苏联的反特小说,体现出传统公案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公案文学中,读者也往往在故事开头就已经知道犯人身份,故事的重心在于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法。

第二,强调群众在监察工作中的无所不在,正如《天罗地网》这个故事中所强调的:“我们是神通广大,但可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是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中国六亿觉悟了的人民,这就是一个天罗地网。”^④程小青的《生死关头》中以一个特务的视角写他从香港返乡打算从事特务侦查活动,却发现走到哪里都像被人监视,“他擦过几个站在过道中看野景的旅客,慢慢地沿着过道走,偶然向几间寝室门内望一望,人家也扭过脸在看他。他总觉得这些眼光好像有些异样,不敢多看。”^⑤在这个故事中,无论是火车上的乘客,还是列车员,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或者街头补鞋的鞋匠,都向侦查机关提供情报,使得特务觉得他无处隐藏。这种对于群众力量的正面歌颂也反映了中国的反特小说与苏联的反特小说不同的旨趣。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的反特小说中往往是要说明敌人是以群众的身份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仍然突出了侦查员个人的英雄主义、知识结构和独立判断,而中国的反特小说与之相反,群众才是火眼金睛的主角,反面人物经常住在偏远地区或者躲在木板的隔间,为了强调群众的力量,中国的反特小说还压缩了对于科学侦破内

① 详细研究可见陈国伟《越境出走:费蒙1950年代犯罪/间谍小说中的香港》,《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② 罗永生用“勾结式殖民主义”一词来分析此类黑帮电影中的文化焦虑,具体分析可见罗永生《殖民无间道》,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陆石、文达《双蹄马铃表》,选自任翔编,《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00(1908-2001)》第四卷:无铃的马帮,第5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④ 时速《天罗地网》,选自任翔编,《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00(1908-2001)》第四卷:无铃的马帮,第10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⑤ 程小青《生死关头》,选自任翔编,《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00(1908-2001)》第四卷:无铃的马帮,第3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容,以避免神话侦破员。^① 为了强调群众的团结,不少反特小说都将故事设定在少数民族生活的边境地区,写在汉族侦查员领导下少数民族如何帮助发现山匪特务。

1955-56年是中国的反特小说的出版高峰,之后中苏交恶,苏联的反特小说不再引进,“文革”时期,反特小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如《绿色尸体》《梅花档案》《一双绣花鞋》等,或者是一些元素融入了样板戏中,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文革”结束后,西方谍报文学、苏联反特小说重新得以出版译介,中国的谍报文学也得以复苏,但真正要等到2005年以后才再度随着谍战片电视剧的传播流行开来,其中知名的包括《暗战》(2006)《潜伏》(2009)《黎明之前》(2010)《红色》(2014)等。而麦家正是最早敏锐地把握住这批谍战题材潮流的作家。

三、麦家的谍报小说

有人以“新智力小说”来形容麦家的作品,对此笔者有所保留,甚至认为智力解谜这一因素的缺乏是麦家作品的缺陷。诚然,这些故事多与破译密码有关,但并非如古典侦探小说,例如最早的爱伦坡的《金甲虫》(“The Golden Bug”1843)或者福尔摩斯故事《跳舞的人》(“The Adventure of the Dancing Men”1903),一样展现密码的能指与所指,而是描绘破译密码者的传奇命运和不幸结局。麦家的小说中对密码是如何的神秘似乎有些故弄玄虚,例如《解密》中交换使用全知视角与限知书信视角来侧写破译“紫密”之难,包括之前有破译者被这部密码逼疯,美国的科学家反复警告不要触碰这部密码,总部专门成立一支破译小组利用各种线索但一年内仍然一无所获等,这些铺垫都是为了反衬出故事主角容金珍的神奇,真正破译密码只用短短一句话带过“一年后容金珍破译紫密”,究

竟他是怎么破译的呢?作者并没有任何交代,“有人说他是在睡梦中——或许还是别人的梦中——破掉紫密的,也有人说他是在跟棋疯子对弈的棋盘上获得灵感的,又有人说他是在读闲书中识破天机的。总之,他几乎不动声色地、悄悄地破译了紫密。”^②麦家在这些作品中反复使用的叙事公式就是交代一个智商高但情商低的天才的传奇背景,这个天才被吸纳进入破译局后行事乖张,不按正常的牌理出牌,在短期内迅速破解了神秘的密码。这其中并没有展现作者或者要求读者用“智力”参与的部分。即使是《风声》这类的表面上最接近古典推理中“密室”(whodunit)的作品,老鬼的身份在阅读到一半的时候也大致可以猜出,而且里面的一些情节,如深夜拔掉窃听线等在逻辑上也并不严密,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反而在悬念的设置上做的更加出色,而麦家的原作特色更在于它结尾中不同的当事人提供的不同版本带来真相的扑朔迷离。

历史的真相并不像密码一样只有唯一的答案,个人的命运也非沿着理性的逻辑而发展,这两个主题始终贯穿了麦家大部分的作品,也构成了他叙事的主要特色:以书信、访谈等方式提供同一事件的不同视角,相互解构,显示历史真相的不可知;以故事结局的大逆转产生造化弄人的戏剧性效果。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既塑造传奇人物又残酷地将他们毁灭,以日常世俗情感来解构革命神圣话语,

① 季星在她的论文中曾引用1950年《文艺报》上刊登的越风文章《对〈无形的战线〉主题的一点意见》指出当时对群众路线与科技描写冲突的讨论,越风在文章中指出公安工作如果把群众活动放在一边不管,便表现不出人民公安工作的无敌威力来。而依靠群众正是区别于人民公安与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本质区别,因此《无形的战线》这部影片的缺点就在于对公安人员在破案过程中的技术性活动作出了不十分必要的强调。见越风《对〈无形的战线〉主题的一点意见》,《文艺报》第32页,1950年13号。转引季星《在娱乐与政治之间——中国反特小说研究1951-1965》第86-87页。

② 麦家《解密》,第14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这些都是麦家对于50年代中国反特小说的颠覆。

麦家笔下的个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杰出的数学家,如《解密》中的容金珍,《暗算》中的黄依依、陈二湖,《风语》中的陈家鹄。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弱智,如《暗算》中的瞎子阿炳听力惊人。他侧重塑造这些个人的传奇性,但他铺垫这些传奇人物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出特殊军事时期浪费人才的荒诞感。前文已指出,50年代的中国反特文学由于强调群众信息战,所以反对将破案人员神秘化,故事希望传递给读者的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侦查员、监察员。而麦家的作品则是将这些破译人员尽量神化。例如《暗算》第一部分“听风”中具有听力特长的瞎子阿炳,他“生下来就是个傻子,三岁还不会走路,五岁还不会喊妈。五岁那年,阿炳发高烧,在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居然会张口说话了,可眼睛却又给烧瞎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奇怪的是,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晓的东西似乎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还要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他知道,半夜三更村子里进了小偷他知道,谁家的媳妇养了野男人他知道,甚至谁家住宅的地基在隐秘地下沉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有一双又尖又灵的神奇耳朵,村子里有什么事,别人还没看见,他已经用耳朵听见了。”^①他侦听敌台的时候要求转速少说在正常转速的五倍之上,而且后来变得同时开六套电台一起听,一天找到的电台是许多侦听员十多天来收获的总和。在《解密》中,容金珍的祖母被描述成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的传奇,参与了莱特兄弟的飞机制造。而容金珍本人从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独自摸索出等差数列的求和演算公式。这些对传奇人物的过度渲染是麦家作品的一个弊病,不免有对当时孱弱国力的意淫之嫌。但另一方面,作者之所以花费了大量篇幅铺垫这些天才在各个学科可能取得的

成就,又是为了营造出让这些原本可以在科学领域一展身手的人才放弃他们的才华,从事破译工作的荒谬感。

文中反复暗示了密码破译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尽管密码界如今科学家云集,有人由此认定它也是门科学,并吸引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在为之献计献策,甚至献身。但这不能改变密码的本质……不论是制造密码,还是破译密码,密码的本质是反科学,反文明的,是人类毒杀科学和科学家的阴谋和陷阱。这里面需要智慧,但却是魔鬼的智慧,只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奸诈、邪恶;这里面充满挑战,但却是无聊的挑战,对人类进步一无是处。^②

乌字一号密码是一部目前欧洲少有的高级密码,保险期限至少在十年之上。破译的原因是想在紧张的外交关系上取得主动权。那么这种紧张关系究竟会推迟多久?一年?两年?还是十年?二十年?我想顶多就是一两年,然后要么是完蛋了,要么就又好了。不管是完蛋,还是又重新好,到那时,我们破译这部密码的价值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变得毫无价值。^③

既然破译密码是“无聊的挑战”,“对人类进步一无是处”,只是战争胜利的手段,并且还有时效性,一旦特殊时局过去,过去一切破译的努力都显得毫无意义,那么国家还要不惜一切代价请一个原本在他们的学科领域可以作出重大贡献的天才参与这一活动则变得讽刺,显示出战争环境,特别是冷战时代下军事斗争/阶级斗争高于一切,人才浪费的历

①③ 麦家《暗算》,第17、8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② 麦家《解密》,第13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史。例如《解密》中的容金珍继承了祖母的数学天赋,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数学奇才,他也参与了建国初期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开发,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很有水平的论文,但在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切以战争的胜利优先,金珍的亲戚决定要“让他去干些更切实可行的事情”,组织上也隐瞒了美国科学家邀请他参与人工智能开发的信函,金珍虽然成功破译了紫密,但最后因为自己的工作手册丢失而发疯。虽然金珍这样的数学天才是虚构的,但他在那样一个冷战时代命运的不由自主却让读者真切的反思了冷战时期国家至上、将人才纳入体制之下观念的悲剧。麦家的作品都让人物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抗日战争、冷战、中苏交恶等,这些都是国家大义下个人最无从选择的一些时期。在《风语》中陈家鹄知道破译工作对个人身心的折磨,他不是没有想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报效祖国,但在那样一个战争环境下,他别无选择,这些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除了时代的制约外,这些个人的悲剧也与他们性格有关。这些奇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一根筋,正如《解密》中总结的“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地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愈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愈容易接近无限,或者说,他们的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所以,大凡天才,他们总是一方面出奇的英敏,才智过人,另一方面却又出奇的愚笨,顽冥不化,不及常人。”^①这些奇人对任何事情都过于执着,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一旦遇到挫折,便手足无措,酿成悲剧。

麦家作品中的个人、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首先,个人与群众。这些奇人的死不少是因为普通群众造成的,这再次颠

覆了50年代反特小说群众至上基本价值观。

《暗算》中的阿炳认为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而自杀,黄依依是被自己丈夫的前妻报复。《解密》中的容金珍的笔记本被火车上的一个普通扒手偷走。在这里通过天才与庸众的对立及后者毁灭前者,麦家也对这一类型文学中的群众力量做出反思。

其次,个人与组织。麦家笔下的个人的特点是大多数人都不是因为坚定的信仰而加入破译事业,他们加入破译工作都不是出于自愿。如容金珍与阿炳,自理能力差,当破译组来招人时,经过他们亲人的同意后加入,黄依依出场时一反50年代反特小说中正面人物的亮相,被形容为像女特务,“有个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30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②她认为自己“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③因此不适合在保密单位工作,最后是在招聘员钱处长的半强迫下,为钱处长的英俊相貌吸引才答应。而《风语》中的前半部分都在写数学家陈家鹄的挣扎,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命令加入破译局。在50年代的中国谍报小说中,为国家服务是理所当然的,而麦家的小说中这些特殊秉赋的个人都是在不愿意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国家机器中的一员,动机上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文学。

正是因为缺乏信仰,所以这些奇人缺乏自我约束,正如孟繁华在《暗算》的阅读中准确的观察,每个人都死于人的欲望。“阿炳以他天才的耳朵识别出了孩子不是自己的血肉,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只能选择了自杀;黄

① 麦家《解密》,第168-16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②③ 麦家《暗算》,第64、6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依依受异域自由文化影响,为所欲为地坚持她的性爱方式,结果死于情敌不共戴天又简略的谋杀;间谍韦夫虽然不是直接死于性事,但他生命垂危之际与美女崇高的献身关系极大;而50年前的情报员死于难产,不仅暴露了自己也暴露了她真实的丈夫。”^①《解密》里的容金珍也是因为偶尔的一次坐火车这样的日常活动丢失了重要文件而发疯。因此麦家神话了传奇人物的技艺,另一方面又解构了革命英雄传奇,在他笔下,这些密码英雄不再死的轰轰烈烈,反而是失败的莫名其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显得异常脆弱。这种反传奇我们在莫言的一些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例如《红高粱》中安排一个秀气的、有文化、有战功的共产党干部任副官擦自己的勃朗宁手枪时突然走火身亡。麦家则更进一步,将英雄传奇与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嫁接在一起显示出这些英雄一旦离开传奇回到日常的无能。

这种以日常的普通情感来解构革命宏观话语的策略同样还体现在麦家作品的叙事结构上。麦家的小说通常以采访纪实的方式模糊小说的虚构性,特别是他的中篇小说,例如《解密》《风声》等,以书信、不同的采访记录等为同一件事情提供了不同的版本,质疑历史的真相。以《风声》为例,故事讲述日伪时期共方间谍老鬼如何在一个被敌人怀疑的封闭的环境下冒死运送情报。结构上分为“东风”、“西风”与“静风”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东风”的结尾老鬼已经牺牲,“我”采访了老鬼的丈夫潘老,他与老鬼实为兄妹,为了革命假结婚,他的陈述代表了革命的官方话语,在他的论述中,老鬼以一幅小草画成功对外传递了密码,死后被追认为烈士。而在第二部分“西风”中当时的另一名现已在台湾的当事人,国统间谍顾小梦,质疑潘老的历史叙述。她指出潘老收藏的老鬼画的小草图根本就是伪造的,真的图在日本人手里,当时顾小梦和老鬼商量过,早已将计就计,告诉了日本

人隐藏在这幅画中的密码,日本人确认了老鬼的身份后对顾小梦消除了怀疑,顾趁机将信息偷偷通知了共方。在第三部分“静风”中,潘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潘教授联系“我”,指出顾小梦的版本也存疑,国共内战期间,潘老为了窃听国民党的情报故意追求顾小梦,得知潘老的真实身份后两人离婚,顾小梦独自去了台湾,因此两人之间有私人恩怨。李秀金对这部小说的三段论式结构有细致的阅读,他认为这三个部分“彼此对历史故事的讲述中表面上有相互印证的一面,但内里相互解构……很明显,‘东风’部分是潘老讲述的历史真实,而‘西风’部分顾小梦讲述的历史真实则是对潘老讲述的历史真实性的否定,并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真实性版本。仅出于‘导向性不对’而添加的‘静风’部分,把当事双方的差异叙述归结为老一辈情感纠葛,这不仅无助于平息争议发现历史真相,反而带来了更大范围的问题——‘一切的历史讲述都是可疑的。历史中社会性理想信仰转化成了个人化私人性的情感选择,在情绪化的叙述里历史失去了理性。’”^②

在《解密》中对于美国科学家希伊斯的描写也与《风声》的多重视角叙述策略类似。书中“我”采访了破译局的郑局长,容金珍的亲戚容先生以及X国(美国)科学家的遗孀范丽丽,三人对美国科学家希伊斯均有不同的看法。郑局长代表了官方的历史结论,希伊斯是一个邪恶的反共科学家,他阻止容金珍破译密码是一个阴谋,在容先生眼里,希伊斯是一位称职而敬业的大学教授,现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几位从N大学出去的学者,多半是他在职的11年间教授过的学生。而在范丽丽的叙述中,希伊斯把密码卖给X国并

① 孟繁华《残酷游戏与悲惨人生——评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

② 李秀金《历史消费中的精神救赎——〈风声〉及麦家的意义》,《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非为了金钱,而是要解救自己的岳父,他是个科学家,政治上很幼稚,容易被利用,但绝没有激烈的反共行为。而且密码被破解后也被X过软禁一直到去世。在这里我们看到“敌人”的形象也会因为不同人的立场而变得复杂。郑局长、容先生和范丽丽与希伊斯的关系是层层递进,越来越私密的,因此希伊斯的论述也就从一个嘴脸丑恶的帝国主义科学家变化成了会不分国籍培养人才、自己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这样一个令人同情的人物。

分析到此,我们可以看出麦家如何从个体性上颠覆传统的革命文学叙事,表现在组织下个人如同棋子般任人摆布的命运的荒谬上。麦家的作品与西方写实派的谍报文学在主题上有些许类同,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引起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的西方读者的一些共鸣,也使麦家所引领的中国当代谍报文学与西方谍报文学有了某些交集。但两者还是有根本的不同之处,具体体现在各自对于组织的态度上。麦家笔下的谍报人员对组织是绝对忠诚的,不会对组织有任何怀疑的态度。他们可能没有信仰,但也不会去质疑组织的信仰,即使是一些使用后设叙事的作品也没有对过去的革命历史有任何的不敬。还是以《风声》的三段论为例,第一部分坚持的是共产党人破译了老鬼舍身传递的密码,第二部分提出其实是国民党人传递了密码,第三部分认为共产党人潘老和国民党人顾小梦说法的分歧可能无关党派纷争,而是他们的私人恩怨。但无论这三部分如何质疑历史的真相,作者仍然是对为革命而牺牲的老鬼表达了深深的悼念,认为革命者“用他们的智慧和信念创造了历史,缔造了浩浩江山”。^①也正因为如此,麦家的作品虽然在情节上写出了小人物在大时代的荒诞命运,但在整体主题上仍然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重塑精神信仰需求,也收获了一批新时期下渴望新“红色文学”的支持者。李秀金在《历史消费中的

精神救赎》一文结尾处的结论基本上可以代表了这类读者和批评家的期望“麦家的小说在吸收消费文化某些流行质素的策略下,力图重建人生的精神信仰空间,我们体验到了那个流逝的历史时代,体验到那个时代曾经有过一种精神充沛的别样人生。在回望历史中寻求到现实缺失的精神信仰,在历史的消费中找到自我精神救赎之路,我们因此有一种阅读的快感。这是麦家在当代出现的意义,也是我们阅读麦家的理由。”^②

虚构有信仰的过去来填补现在的信仰真空,谍报剧在当代中国的流行不失为官方倡导下的集体革命怀旧。麦家作品中的天才个人都在成功破译密码之后遭遇到不幸结局,换句话说,这些奇人要在一个革命进行时中才有意义,一旦任务结束,或者脱离了那个环境,这些人将无法存活。例如《暗算》中的瞎子阿炳,在大功告成之后他成为了英雄,生活的很轻松悠闲,组织安排结婚,但孩子出世之后,阿炳神奇的听出孩子不是自己的,气愤难当,触电自杀。虽然这个结局非常荒诞,但也可以促使读者反过来思考,如果阿炳没有死,在当代社会,解密期已过,当他脱离701的封闭环境,这种除了听力外情商为零的个人是否可以存活呢?《暗算》中的破译专家陈二湖似乎回答了这种假设,他退休后无所事事,失去了人生寄托,差点被送往精神病院,组织担心他发病,召他回来破译一部没有意义的密码,从此之后陈二湖“脸上总是透着饱满的精神,看起来是那么健爽,那么称心,那么惬意,那么从事又满足。”最后他破译密码成功,成功的喜悦引发心脏病,死在了工作岗位。这里表现的是个体被破译工作异化。《暗算》中的黄依依与《解密》中的容金珍死亡或疯癫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一度离开了

① 麦家《风声》,第15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② 李秀金《历史消费中的精神救赎——〈风声〉及麦家的意义》,《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701 破译局这个封闭的环境,黄依依被医院的厕所弹簧门打中头部后,撞上水管口身亡,而容金珍则是在出远门开会的火车上丢失了自己的工作笔记本后发病,此处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层时势造英雄的吊诡:701 破译局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既是如前文分析的对人才的一种禁闭,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一种革命时代的象征,那样的环境下可以接纳这些奇人,一旦失去了那样的革命环境和时代,回归到日常生活的建设上,这些奇人都将凋零。因此麦家的谍报小说并不单纯,它既写出了个人在大时代下的牺牲,也能读出对那些产生传奇的特殊革命时代的怀念。

综上所述,麦家的作品或许从语言艺术性上看并不出彩,而且阅读了几部之后会有情节雷同之感,作家如何在今后的创作中挖掘新的题材,自我突破是他将来要克服的挑

战。但如果我们将麦家放在中西谍报文学这一文学脉络中去看,显然他对于中国当代的谍报文学这一类型的重新挖掘与创新做出了不小的成就。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几组二元关系:日常的世俗生活与革命的精神信仰,非理性与理性,疯子与天才,墙内与墙外,它们之间的张力丰富了他的小说多重的阐释空间,既符合了一批想要找寻革命信仰的读者需求,也表达了文学反映人性的要求,这也许就是麦家的作品得以同时在国内外国度都较高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魏艳,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博士,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教。

(责任编辑 王 宁)